

科学理想 爱国情怀

——评电影《钱学森》

□张阿利

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与西部电影集团公司等联合推出了反映钱学森生平事迹的大型人物传记故事影片《钱学森》。本片将钱学森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表现了一个伟大科学家坚定不移的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理想和情怀。电影重现了钱学森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和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不平凡的一生,从历史揭秘的角度给观众以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感受。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本片充分运用了时间和地域上的大幅跨度,从钱学森在旧上海与蒋英的相爱到在美国受到的迫害;从旧中国的贫弱到新中国自强不息的崛起;从义无反顾向往祖国到历经困难终于返回中国,投身新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电影《钱学森》无疑实现了地理上的广度和时间上的深度的巧妙结合。在短短90分钟的有限篇幅内,主创者发挥了影像本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优势,在讲述钱学森为国家科研事业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的同时,勾勒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自强不息的发展道路。钱学森的生平事迹虽然曲折,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映射着20世纪40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像钱学森和科学家友来这样出国留学,立志学成后归国效力的年轻人是那样一个动乱时代语境下爱国青年的必然选择和可贵奉献。影片在钱学森归国之后,展示了新中国“从无到有”的国防航空航天工业的建设历程,以钱学森和导弹研发为情节主线来展开故事。除此之外,影片还对“朝鲜战争”、“冷战”、中苏关系等重大国际和时代背景进行了宏观展现,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青年的命运紧紧依附于时代命运,具有宏大的叙事格局和史诗品质。

国产电影在人物传记题材上一直鲜有突破,比起人物传记的《巴顿将军》《美丽心灵》《莫扎特传》等外国传记电影,之前的一些电影虽然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一直难于跻身主流商业市场。近些年来,中国电影人开始拓展思维,使得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出现了新

■艺 谭

军事电影：在产业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 东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正在飞速发展。但票房与影片数量的繁荣是否意味着中国电影真正的繁荣?少数“大片”统治国产电影市场,观众的看片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普通常规电影得不到市场尊重,对创作者的积极性也是伤害。作为电影重要类型的军事电影在产业化大潮中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顿。如何在产业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军事电影面对的新课题。

关注观众对军事电影的新诉求

军事电影长期以来一直是受观众青睐的影片样式。然而,随着国家较长一段时间处在和平环境下,观众对军队和军事的关注有所减弱,似乎只是在国家有了灾难时才想起人民解放军。军事电影从曾经非常中心的位置被挤向了边缘。在一些人的心里,军事电影就是一种行业片,它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但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军事新格局形成,中国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担负更加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自海湾战争以来,世界上几次大的局部战争发生,公众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有所增长,对军事的关注度大大增强,他们意识到,国防安全、军队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由此,催生了观众对军事电影新的诉求。观众渴望从军事电影中获得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愉悦,还有对国力军力综合实力的考量,他们渴望通过电影了解当今中国军队的现状,判断军队的战斗力,判断自己的人身及财产是否安全。

八一电影制片厂近几年创作的“三惊系列”(《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表面看是救灾影片,但意义绝不仅仅是救灾。这几部影片实际上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当国家遇到突然情况时,军队能否调得动,冲得上。因为救灾的过程很复杂,对部队的协调指挥是一个考验。其二,独生子女士兵能不能战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支军队是由这么多的独生子女组成的,他们不能承担起保卫国家、保卫和平的重任。影片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了公众关心的问题。

军事电影的创作者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往军事电影从中华民族苦难历史,从前辈的革命业绩中寻找精神力量,而更应关注我们这支军队的当下状态,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部队组织管理、应急能力等等。从当前军事电影的现状看,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影片数量仍然很少,质量也不能尽如人意。

重视科技强军给军事电影带来的新机遇

新世纪十年,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最快的十年。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加,中国军队在国际社会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任务。比如军队参与国际维和、索马里护航等等,军队自身建设也取得了新成果,这些都成为军事电影内容方面的新热点。

2011年,有两部反映科技强军的影片《歼十出击》和《飞天》相继上映,这两部影片首先在内容上有所突破。《歼十出击》是近50年来首部反映空军主战部队训练生活的作品,《飞天》首次在银幕上展示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纪录片《为了生命》跟随维和官兵的脚步,记录

了中国维和部队在世界各地执行维和任务的历程。

强军之路,最关键的是人,是人的素质与观念的提高。军事电影的发展同样面对创作观念与理念的改变。当今世界的军事格局屡屡在发生变化,军事电影的创作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大格局的变化,就会失去影片的时效性,失去观众的观影热情。

此外,一些社会、人文范畴的观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的进程,也在不断调整、更新。这些都对传统的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比如个人与集体、尊重生命与牺牲精神、艰苦朴素的传统与现代化建设、以人为本与军队纪律等,这些军事电影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影片《集结号》受到追捧,一是战争真实性的表现有所进步。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体现了为小人物正名的人文内涵。这与当今对生命的尊重是一致的。

与当下人民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相比,军事电影中的“现代化”显得有些滞后。以反映军兵种为例,军事电影中的军队基本以陆军为主,描写空军、海军的影片屈指可数。像二炮这样的高科技部队,还没有在一部军事影片中露过面。至于更深入、细化的表现某些新技术兵种更是无从谈起。军队的现代化气息只能从一些电视剧中去感受。在这个领域,电影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

了解市场对军事电影的新需求

电影进入产业时代后,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不再是“卖方”市场,而更多地走向“买方”市场。观众的需求左右着电影的制作,但高明一点的制作者会有意识地塑造观众,培养观众。对军事电影比较关注的,主要有两类观众,即军事迷和战争电影迷,他们从两个层面,分割了军事电影的两大块基本观众。

军事迷,是近年来形成的军事电影一个特殊的观众群。他们对明星、名导并不关心,甚至认为影片中是否有故事都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军事本身,影片中的战争是以哪段战史为原型的?影片中使用了什么武器?出现了什么新装备?大到飞机、舰船、坦克大炮,小到军装、军衔、军品的使用,还有演员军事动作是否准确到位,这些都是很考究的。由关心军事,继而关心军事电影。影片《歼十出击》上映时,很多十几年不进影院的军事迷就是为了能在大银幕上一睹歼十战机的风采,买票看电影的。这一部分观众虽然数量并不很多,但对军事电影的创作很有启示,即我们的创作者要更专业、更内行,有时一些小的失误会招致他们对整部影片的否定。

另一部分观众应该是电影的超级粉丝。他们喜欢看电影,喜欢把看电影作为主要的业余消遣。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看着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对军事电影的兴趣主要基于战争类型片的标准。他们要看的是电影里的仗打得漂不漂亮,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喜欢以好莱坞战争大片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军事电影。对于这部分观众而言,包括军事电影,娱乐性是第一位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观众是目前影院的主体观众。满足不了他们的口味,电影通常没有票房。

难题在于,军事的特殊性会限制它在类型框架里的发挥,但是不顾类型的规则,电影也很难成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创作者一直在努力探索。比如军事片中的女性形象,影迷们大多都表示反感。他们认为,战争就是应该“让女人走开”。军事片应该是纯爷们儿的,战争片中的女人就是花瓶。可是按照类型的规律,女性角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她们应该与影片中的男一号产生爱情关系,这样的影片才会有观众看。但如果女性角色写得太多,特别是影片中的感情纠葛多了,军队方面认为脱离实际。因为军队对军人婚姻有严格的纪律,超出尺度是不被允许的。

产业化对电影的传统制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延续多年的先写剧本、找导演,电影拍摄完成后,再进入宣传发行环节,最后到影院与观众见面的模式已不再适应今天的电影市场,电影制作显现出项目化操作的模式。而军事电影在产业的链条上,还没有完整启动,特别是营销还是军事片的软肋,办法少,模式陈旧。一些影片口碑尚可,但票房不佳;也有一些影片考虑市场多些,但又走入了过度娱乐、消解主流价值观的泥潭。影片《集结号》在军事电影商业性上做了一点尝试,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回报,但影片的情节也受到一些质疑,认为其不符合人民军队的实际。操场和市场,是军事电影创作中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创作生产思路,努力探索,把握机遇,实现军事电影在产业化条件下健康有序地发展。

方的要求,看似调侃却坚定地透出了隐含的铮铮风骨。

再次,影片的人物形象塑造得较为丰富饱满,富有个性。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人物传记影片,本片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塑造得比较丰满,摆脱了扁平化、片面化的弊病。除钱学森外,聂帅、科学家永来、移民局局长金博儿、美国导师冯·卡门、导弹研究院副院长张工农等配角性格的塑造也较为成功。每个人物都有其自身性格变化的合理性,其行动也随着环境的改变呈现出内在的动因和逻辑,避免了角色塑造上的虚假。相较于钱学森的义无反顾,永来的理智和谨慎则彰显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沉稳、慎重,最后其在钱学森的建议下投身我国核武器研究事业,实现了他和钱学森年轻时的承诺。

影片并不流于表面上的明星阵容和特效制作,而是从“爱国主义”的故事内核上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进行了借鉴,整个影片叙事流畅,戏剧冲突集中尖锐,剪辑行云流水,有极强的可看性。特别是影片前半段,对钱学森在美国一系列遭遇的情节展示扣人心弦。“一个钱学森,顶军队五个师”——这是美国军方给钱学森的评价,他的离开使美国军方深感不安,在麦卡锡主义的大潮下,钱学森的归国之路异常艰难。审讯、牢狱、软禁,钱学森正是在这样恶劣的逆境中写出了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当年中美两国对钱学森的争夺堪称一段没有硝烟的世纪暗战,钱学森的回国和两弹一星的成功导致世界格局被重新定义,使得观众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电影《钱学森》是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与西影集团联手推出的近年来最为优秀的主旋律大片之一,也是我国近些年来少见的优秀人物传记影片,对于反思历史、重振民族精神将起到重要的文化促进作用。本片推出恰逢钱老诞辰100周年,相信凭借其大片式的精良制作和先进的电影创作理念再配以强大的后期宣传,定会在主流电影市场上有所作为。



电影《柳如是》给人的最初印象往往是情节张弛、力度不够,没有将历史戏剧化等等。但是,当看到海报上“新文人电影”几个字时,笔者似乎找到了答案。娓娓道来的叙述、沉郁内敛的意境——这恰恰是《柳如是》的特色和优势。

“文人电影”的概念最早源自香港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分析,即“戏人电影”和“文人电影”。“戏人电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史传传统”,“文人电影”则继承了“诗骚传统”。如果说“戏人电影”重故事,是电影发展的主流。那么,“文人电影”则重意境,宁可淡化情节,是电影发展的潜流。电影《柳如是》在讲述“晚明孤岛”文人处境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将镜头对准江南的烟雨蒙蒙、湖光山色,以及园林草木、又融入诗文唱和、昆曲古琴,无不体现古典的诗意境界。

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是“文人电影”的代表作,影片营造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意境,影响了一代影人。20世纪50年代的《林家铺子》、60年代的《早春二月》,再到80年代的《城南旧事》,不同年代的“文人电影”沟通了一条传统文化到现代电影艺术的路径,中国文人的审美和情怀也在电影中得到了延续。

在好莱坞类型片中,主人公要靠一次次克服困难以推动情节,且必定会有一场精彩的动作戏压轴。而“文人电影”则相反,它满足的是观众的心理认同,而非视听享受,是一种对“慢”和“静”的追求。“文人电影”并非取消矛盾冲突,而是用人物情感的矛盾来代替动作剧情的矛盾,人物情感的宣泄正是影片的高潮。电影《柳如是》中,柳如是的身分被人视作“无义”,她一生都在追寻的就是“义”。那天晚上她跳荷池自尽,将全片的情感推向了顶点。反抗社会而无能为力,不惜以死亡换来精神的不灭,人物的宿命悲剧震撼人心。正如电影首尾交相呼应的那句自白:“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又恰恰生对了时代。”

理解“文人电影”,就要提到“文人”。中国的文人,并不仅是文学家,更确切指的是“士大夫”,或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电影《柳如是》就透过“钱柳因缘”这一个“点”,再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风貌和生活画卷。同时,中国的文人不仅有知识,还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强烈使命感。才华横溢的柳如是,虽是

来自全国“两会”的声音

李前宽:电影创作应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李前宽认为,中国要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跨越,还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电影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电影人才,尤其是中青年电影人才。第二,要重视剧本创作。目前,中国电影的精品力作还不多,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水平提升的要求,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下,观众对一些粗制滥造、格调低俗的电影的批评是正常的。我们电影人应该在剧本创作上下功夫,要有打造精品的意识,静下心来,保持一颗虔诚、真诚的创作之心。同时,创作者应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过度开发、重复开发,一窝蜂地抢夺历史资源,对电影创作都是不利的。第三,呼吁建立中国的HBO(电影台)。我们提出中国电影“走出去”,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困难和问题。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院线和电影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中国的HBO,实现电影频道向电影台的功能转换,无疑有助于中国电影的传播和推广。第四,实现电影院线的整合。当前,中国电影院线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城市院线扎堆现象普遍。为此,要努力实现电影院线向全国的辐射,加强中西部地区电影院线建设,降低电影票价,这对培养中国电影观众和市场都是有利的。最后,要提高电影批评的质量,自觉抵制吹捧文章、人情文章、红包文章。

王兴东:保护电影原创者的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从关注《电影产业促进法》和今年要修改的《著作权法》出发,强调保护原创的重要性。剧本是源头,是根本。编剧是第一生产力。剧作使导演有了工作,剧本使演员有了角色,剧目使投资者找到了项目。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的一切。中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大国,惟有保护原创、尊重原创、鼓励原创、奖励原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原创作品,实现电影强国之路。他认为,原创是作家长期积累和感受的结果,是大脑智力成果的产物。要提高电影原创,首先,要重视文学在电影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需要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中国创作不是工业生产的大拼杀,流水线的产物,而是像农业生产一样,有一个耕种、培育、收获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急于求成、操之过急,都有违剧本创作的艺术规律。最后,社会应该给电影创作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剧本的版权、编剧的创意予以保护,为编剧营造一个安心的创作环境。

田青:重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面对地方剧种、文化资源趋同化、过度消费的趋势,全国政协委员田青认为,应重视保护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他认为,传承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每个人都有不可替代的祖传记忆,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在一些国家,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还被誉为“国宝”。对于他们,保护是第一位的,全社会要尊重传承人的付出和地位。基于某些领域传承人的去世、断档问题,他呼吁加强中青年传承人的培养,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和热爱中国的传统艺术。

宋春丽:文艺工作者应加强行业自律

全国政协委员宋春丽认为,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艺人才建设不能忽视。文艺工作者应提高道德修养、理想情操,从自我做起,自觉抵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建设,以德艺双馨为自己的从业标准,努力做到“爱国、为民、崇德、尚艺”。

■评 点

《柳如是》

又见「文人电影」

薛 舛

女子,也充满抗争精神,随时准备为国家“殉节”。而电影的巧妙之处还在于用对比的手法塑造陈子龙和钱谦益,两个人物在“才”与“义”的基础上加入了“情”的抉择,电影中刻画的传统文人的境界与痛苦着实耐人寻味。

很多人忽略文学对电影的基础性作用,而“文人电影”恰恰又极大的体现了电影的文学性。电影《柳如是》脱胎于史学大家陈寅恪晚年的封刀之作《柳如是别传》。导演吴琦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道:“历史远去体温渐失冰凉若石头。文人赏石,将石头看通看活看透,看出生命看出心中的山水、宇宙。关于影片调性,姑借米芾评石的四字:瘦、简约。穿越复杂后的简约。漏、藏与露。聚焦于钱柳因缘,窗外是大厦倾覆。透,通透。一种圆润的光感。皱,一唱三叹。捕捉生命之湖漾开的涟漪。”一位文人为另一位文人写传,现在又被一批文人拍成“文人电影”,展现的也是文人的时代和文人的情怀。不难想象,几位主创的纪录片创作经历,让“纪录片精神”融入了《柳如是》。而“文人电影”不慌不忙的叙述,清新雅致的风格,也正和近些年一些优秀的人文纪录片有着相通的地方。

今天的国产电影有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很多商业电影,将各种票房元素生硬累加,片面追求所谓“大片”,急功近利把观众“骗”进电影院。结果是进入恶性循环,以至于很多观众越来越不相信国产电影。而“文人电影”却不刻意迎合市民趣味和大众审美,其展示的影人“才情”,是个性的、有诚意的,必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成熟多元的电影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文人电影”。

诚然,笔者提到的“文人电影”只是个相对概念,并不能生搬硬套解释所有的问题。有人说,用商业片的手法拍摄文艺片,用文艺片的气质包装商业片,“新文人电影”也许就是这样吧,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产生更多《柳如是》这样的影片。